

【文学艺术】

抗战时期延安文艺述评

焦泰平

(长安大学 人文社科部,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涌向延安。他们用艺术的形式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唤起了广大民众救亡图存的意识,并为抗战时期的军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延安文艺始终回荡着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主旋律,以其广阔的历史画卷、深厚的思想内涵为人们从文化角度提供了认识抗日战争的生动材料。

关键词:抗日战争;延安文艺;民族觉醒

中图分类号: J05 **文献标识码:** A

Statement and Comment on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JIAO Tai pi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utburst of Anti-Japanese War, a large number of progressive workers in literature and arts streamed into Yan'an and there they made full use of literature and art to propagate and organize the popular in order to arouse the awareness for saving their country existence. This campaign supplied rich spiritual food for the soldiers and people during the war. The main trend throughout literature and art covers patriotism and revolutionary heroism and their vast historical pictures and deep-thoughtful contents supplies people with vivid materials from the angle of literature to understand the war.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national awareness

延安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诞生在抗战烽火中的延安文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紧密配合当时的斗争形势,充分发挥了文艺团结人民、唤起民众的巨大作用,在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极其辉煌灿烂的一页。

一、奔赴延安 抗日救亡

1936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危机面前,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的开始。这是一个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侵略的时代。作为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中心的延安,已成为当时人们心中向往的

革命圣地。他们从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百川汇海似的奔向延安,其中就有大批的文艺工作者。

丁玲是最早由国统区来到陕北的著名作家。1936年11月,她冒着生命危险,历经艰险,由北京、上海、西安辗转进入陕北根据地。在毛主席的安排下,她跟随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随军上了前线。战争生活的深刻体验使她写出了《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彭德怀速写》等具有新鲜内容和风格的报告文学。毛泽东对作家奔向抗日用武之地十分赞赏,挥笔写下了《临江仙 给丁玲同志》一词: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

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1]。

这对丁玲是极大的鼓舞!她决心拿起“纤笔一枝”,与战友们并肩战斗,为抗日救亡尽力。1936年11月22日,她率先参加发起筹备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这是陕甘宁边区最早成立的大型文艺社团组织。在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应邀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特别提出,文协的同志要“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并且强调:“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2]毛主席的这段话,是他在陕北对革命文艺所发表的最明确、最早的意见。他把文艺与军事等的关系概括为文武两条战线,不但阐明了中国文艺协会的性质,也指出了文协的任务与方向,给文协的同志以极大的鼓舞。

丁玲担任文协主任后,决心使这个“文”的方面军充分发挥作用,用“一枝笔”参加新的战斗。在一篇题为《刊尾随笔》中,丁玲写道:“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去打毁敌人。但我们也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着冲锋侧击的一枝笔!”“一枝笔”同“一杆枪”在丁玲看来,在抗战中有着同样的重要作用。要做一个文化人,必须先做一个战士。“七七事变”后,丁玲激愤不已,再次要求上前线。党中央随即任命她为新组建的有50多人参加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1937年8月19日,他们发出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前致全国爱国人士电》,表明了他们奔赴抗日战场的决心和目的:“我们愿赴疆场,实行战地服务,我们愿意以我们的一切贡献于抗日前线,与前线战士共甘苦,同生死,来提高前线战士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牺牲精神,唤醒动员和组织战地的民众来配合前线的作战!”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成立,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它使文艺直接为抗战服务,为时代的需要服务,对文化人来说,不但磨炼了他们的意志,而且使他们在民族危亡时刻冲在了第一线。正因为这个原因,丁玲的名字立即受到中外新闻界、文化界的广泛注意,不少人为她著文,如《丁玲在西北》《丁玲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和丁玲一起在前线》等。其中徐盈的《丁玲在前线》这样生动地勾画出了抗战初期丁玲和她的战友们的形象:“她的脸圆圆的,几乎成一个圆形……红星的帽子压在头发上,两个酒窝时常在笑……这是一群热情的、年轻的、战斗性的慰劳者,他们一律穿蓝布军服棉袄裤,和他们的主任丁玲或副主任吴奚如完全没有两样。他们分着总务、歌咏、戏剧、通讯等部分,这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团体,每一个细胞都是活活泼泼地怀着希望献身给工

作——他们的心熨贴着战士们的心,歌声把大众融为一体。”西北战地服务团自1937年8月22日离开延安,东渡黄河,然后由临汾到太原,不久首途榆次,跨向硝烟弥漫的娘子关。他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晋察冀,用他们的笔,用他们的口,用他们的满腔热情,为中华民族的生死搏斗而呐喊,而歌唱。

丁玲在陕北的活动是众多文化人在抗战中投身革命洪流的一个缩影。民族的危机,大众的苦难,直接激发了成千上万文化人固有的“感时忧国”的情怀,在他们身上,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自强不息的群体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张扬,表现出一种最深沉的历史使命感,他们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连接在一起,并且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召唤人民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抗战期间,大后方文艺人才涌向延安曾有过两次高峰,第一次是1937年至1938年,第二次是1939年至1941年。随着第一次高峰来延安的,首先是经过长征的苏区文艺工作者,如成仿吾、李一氓、李伯钊等;随着第二次高峰来到延安的是来自上海乃至全国各地大后方的一大批文艺家,如吴奚如、周扬、冯雪峰、周立波、萧三、何干之、柯仲平、冼星海、何其芳、沙汀、卞之琳、萧军、崔嵬、张仃、石鲁、古元、韦君宜、柳青、孙谦、王汶石等。他们来延安前或生活在国统区,或生活在沦陷区,或生活在其他解放区;有的人是五四时期和左联时期已经成名的作家、文艺家,更多的是来到延安后才开始创作的文学青年。虽然他们在出身、职业、经历、社会地位、文化程度、情感表现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在特殊的历史情势下,他们不约而同地冒着生命危险,穿越重重障碍,为了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标,汇集在了宝塔山下,延河之滨。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支持和具体帮助下,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边区音协、剧协、美协,抗战民众等剧团和群众性的诗社相继成立,专业性文艺刊物如《文艺突击》《大众文艺》《新诗歌》等相继创刊,这些文艺社团和刊物在抗日烽火的照耀下,揭开了抗战时期延安文艺的新篇章。

二、用文艺唤起民众

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在“全民抗战”的口号下,只有充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到救亡图存的斗争中去,才能赢得民族解放的最终实现。延安的艺术家们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肩负的神圣职责。抗战爆发后他们充分利用战地通讯、报告文

学、街头剧、街头诗、朗诵诗、鼓词等短小精悍、易于被群众接受的艺术形式,向民众、士兵宣传抗战,在陕甘宁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使文艺真正成了唤起大众、组织大众的有力武器。

1938年4月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的晚会上看了秦腔《升官图》《二进宫》等节目,对工会负责人齐华说:“群众非常喜欢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接着齐华把文协的柯仲平同志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对柯仲平说:“你看秦腔这种形式,群众这么喜欢,就是戏的内容太旧了。如果我们把它换成抗日的内容,就成为革命的戏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搞?”柯仲平立即热情地回答:“应该,应该。我们立即就去办理。”柯仲平回去后立即招兵买马,不久就筹建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剧团团歌“你们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开宗明义申明了剧团活动的宗旨。舞台两旁贴着一幅对联,上联“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下联“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横额“团结抗战”,鲜明地表达了剧团为大众服务的指导思想。

1938年7月4日晚,在延安城内的火神庙戏台上,正式公演了马健翎创作的两个秦腔革命现代戏《好男儿》和《一条路》,看完两出戏,台下观众被剧情感动得激情沸腾。戏已完了,台下观众却纹丝不动,突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冲破云霄,掌声、口号声混成一片,气氛非常热烈。民众剧团用秦腔这个旧酒瓶装了抗日斗争的新内容,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新秦腔唤起了广大人民的救亡图存意识,坚定了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这一时期的诗歌在宣传群众、鼓动群众方面也发挥出了战斗动员作用。延安的诗人们是“时代的鼓手”,他们以激越昂扬的声音,高唱战歌,表现了争取解放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和觉醒中的人民的力量。1935年底成立的“战歌社”是延安最早的自发群众性诗歌团体。这个社的贡献在于他们自觉地发动了延安的朗诵诗运动。1937年由陕北公学学生会发起举办了一二·九运动六周年纪念晚会,晚会用诗歌朗诵的形式纪念这个革命节日。朗诵者同时就是诗歌创作者,诗人们抑扬顿挫的吟诵不仅很好地表达了自己的情绪,也在听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人们跃跃欲试,争相登台朗诵,台上台下融为一体,群情振奋。大家在诗歌朗诵过程中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对创造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1938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毛主席亲自参加了诗歌朗诵会,给诗歌朗诵者以极大的鼓舞。“战歌社”社长柯仲平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热情洋溢的文艺活动家、社会活动家。他是延安诗歌朗诵的发起人,又是延安最活跃的朗诵诗人。这天晚上,他充满激情地用粗犷宏亮的声音朗诵了长诗《边区自卫军》。毛主席听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一首很有影响的诗歌,是当时延安长篇叙事诗最优秀的成果之一。以后每当集会,只要柯仲平在场,就有人邀请他朗诵《边区自卫军》,使这首诗得以广泛传播。

1938年夏天,战歌社、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诗人在一起商讨诗歌创作如何走向大众,为抗战服务的问题。柯仲平、田间、林山等就酝酿着发动诗人们利用街头诗这种形式,向群众做一次诗歌大普及。接着由柯仲平等主持起草了《街头诗运动宣言》,《宣言》指出,开展街头诗运动的目的“不但在利用诗歌作战斗的武器,同时也就是要使诗歌走到真正的大众化的道路上去;不但要有知识的人参加抗战的大众诗歌运动,更要引起大众的‘无名氏’也多起来参加这运动。”1938年8月7日这一天清早,延安街道上挂起了“街头诗运动日”的巨大横幅。红红绿绿的诗传单、诗标语、诗专栏到处都是,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观看各种形式的街头诗,倾听着诗人们的大声朗诵。许多出名的诗人和无名的诗人都踊跃地参加了这一运动。其中田间的《假使敌人来攻边区》、骆方的《我们向你们敬礼》、贺嘉的《岗哨》、柯仲平的《保护我们的利益》等,表现了中华儿女在苦难中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觉醒后的抗争。而张季纯的《给我一支枪》则以抒情诗的形式,表现了血泊中站起来的主人公“给我一支枪,我要上战场”的心理渴望,这是当时中国人民社会心理的艺术概括。

以冼星海为首的延安音乐家们创作的大量救亡音乐作品,在团结人民、鼓舞军民抗战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感召作用。1935年冼星海从巴黎留学回国,1938年11月3日来到延安,开始了新的生活。民族的危亡、大众的苦难、救亡的迫切,无不在他胸中澎湃汹涌,激荡起了他那无法遏止的创作灵感。1939年一年内,他在延安创作了6部各具特色的大合唱,而最负盛名的就是具有史诗般性质的《黄河大合唱》。由冼星海谱曲、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完稿于1939年3月31日。5月11日,鲁艺举行建院周年纪念音乐会,正式公演了《黄河大合唱》。合唱团有100多人,还有乐队伴奏,由冼星海亲自指挥,毛主席也亲临现场。演出非常成功。强大的阵容,磅礴

的气势,感染激荡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毛主席高兴得跳起来,连声称赞:“好!好!”当冼星海问他《黄河大合唱》怎么样时,毛主席欣喜地说:“百听不厌。”给《黄河大合唱》以极高的评价。诗人萧三说这次演出最出色,认为《黄河大合唱》是一部巨大的作品,很有气魄!他还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他听后的感受:“一时作船夫的挣扎,一时作河东父老的哀鸣,最后作黄河的怒吼。歌声时而呜咽,如泣如诉,时而悠悠然,如淡雅悠闲的田园诗,最后真感到黄河之水天上来,滚滚白浪滔天,波浪万丈汹涌,到了这里我对作曲者星海同志真欲五体投地了!”^[3]《黄河大合唱》是象征着中华民族伟大形象和雄伟气魄的千古绝唱。这以后,它几乎成了延安每次群众大会必唱的歌曲。《黄河大合唱》开创了新型救亡歌曲的新局面,它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鼓舞着千百万中华儿女自强不息,不屈不挠为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这一时期,全国大部分参加救亡运动的进步音乐工作者都聚集到了延安。除冼星海外,还有吕骥、贺绿汀、马可、张寒晖、李焕之、郑律成等。他们与诗人们合作,带来了延安的新音乐运动。《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共产党像太阳》《延安颂》《军民大生产》《八路军进行曲》等歌曲,不仅在解放区,而且在全国广为传唱,产生了巨大的宣传和鼓舞作用。可以说,当时的延安既是革命的战斗的城,也是充满歌声的城。老舍在他的《剑北行》中这样描述延安新音乐运动的盛况:“男女青年,谐音歌咏,中西乐器,合奏联声,自制的歌,自制的谱,由民族的心灵,唱出抗战的热情。”在新开的窑洞,在山间的小路上,“唱着,我们开山;唱着,我们开田;唱着,我们耕田;唱着,我们抗战……”^[4]人们高唱着革命歌曲,以积极乐观的情绪,迎来了抗战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除戏剧、诗歌、音乐外,其它艺术形式如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美术等,也都突出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在面临强敌侵略时同仇敌忾的民族意识,回荡着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主旋律,显示了抗战中延安文艺“血与火”的品格和强烈的时代精神。

三、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的全面繁荣

抗战时期的延安文艺,自始至终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和指导。在延安,毛泽东与文艺家们广交朋友,全力支持和推动文艺向前发展。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文艺界的整风会议——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根据会前与几十名文艺工作者的谈话和座谈中掌握的延安文艺发展的第一手资料,

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对解放区文艺工作作了具体的科学的总结,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5]。

在《讲话》的指引下,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奔赴抗战前线,深入农村、工厂、连队,与工农兵群众紧密结合。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这一时期文艺表现的内容已不再是抗战初期的抗日救亡、唤起民众,而是转向表现中国人民具体的抗战行为,如歌颂军民团结、表现生产建设、反映妇女解放、礼赞延安、反映解放区新生活等,表现了昂奋的民族精神和热烈的时代氛围。

戏剧是《讲话》以后最先取得成就的艺术形式。延安的戏剧工作者在民间秧歌的基础上,吸收了话剧等艺术表现手法,创造出了一种反映劳动人民新思想、新生活的新秧歌,并且很快形成了新秧歌运动。新秧歌运动发端于1942年底和1943年春节。1942年12月,刘炽、王大化创造性地利用了旧的民间秧歌形式,第一次演出了新秧歌。他们头包白羊肚子毛巾,手持镰刀、斧头,扭着欢快的舞步,立即吸引了广大观众。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形式的创造和发现,极大地鼓舞了文艺工作者。到1943年春节,经集体讨论,安波执笔创作了新秧歌剧《兄妹开荒》,由王大化、李波首次演出。这种熔音乐、文学、舞蹈于一炉的形式,宣告了新秧歌剧的诞生,它轰动了整个延安及陕甘宁边区。接着,延安所有的文艺团体都纷纷组织了自己的秧歌队。特别是鲁艺百余人的秧歌队,连续在杨家岭、中央党校、联防司令部直至南泥湾等地进行表演。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都亲自前往观看,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

1944年春节期间,延安新秧歌运动掀起了更大的热潮,阵容更壮阔,声势更浩大,演出的时间更长,节目更多。延安城共有40多支秧歌队上街演出,出现了锣鼓喧天、万人空巷的文化盛举。新秧歌剧有表现生产劳动的,也有反映减租减息和自卫防奸的,他们以生动、活泼、健康、愉快的艺术风格,为广大群众展现了解放区生活中新的人物、新的精神面貌。其中《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刘二起家》《夫妻识字》等演出最多,影响最大,老幼皆知。

在《讲话》发表之后延安兴起的规模巨大、久盛不衰的新秧歌运动,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简单的一般的民间娱乐活动,而是有力地显示了文艺大众化的价值,是一场富有新的时代特色和群众特色的奇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她孕育着丰富的社会历史的、文

艺实现创新更新的萌芽,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抗战胜利的乐观情绪。

延安新秧歌剧艺术直接诱发了现代民族新歌剧的第一部成功之作《白毛女》的诞生。《白毛女》是 1945 年 1 月至 4 月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它集中体现了集体的智慧和诗人、戏剧家、音乐家(贺敬之、丁毅、马可等)的辛勤劳动,广泛地吸收了中国古典戏曲、西洋歌舞歌剧和“五四”以后话剧创作的优点与特色,是一种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新剧种。该剧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演出时,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热情肯定和赞扬。在抗战后期,歌剧《白毛女》演遍了各个解放区。《白毛女》的故事家喻户晓,喜儿的动人歌曲广泛传唱,鼓舞着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为求解放而奋起斗争。

此外,在旧戏改革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民众剧团演出的新秦腔《血泪仇》、《穷人恨》(马健翎)、《官逼民反》(钟纪明、黄俊耀)、《放下你的包袱》(钟纪明)等,开了地方戏表现现代生活的先河。在众多作者中,马健翎更是卓有成效。他在延安时期一共创作秦腔现代戏和新编秦腔历史剧 15 种,眉户剧 5 种。其中代表作《血泪仇》在解放区广为演出,几乎家喻户晓,可以和歌剧《白毛女》相媲美。另外,在地方戏的基础上创造新历史剧方面,平剧《逼上梁山》(杨绍萱、齐燕铭)、《三打祝家庄》(延安平剧院集体创作),是比较成功的尝试,体现了我党提出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方针的正确性。毛泽东对此项改革给予了积极及时的肯定。他在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说:“你们的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6]。这些戏剧后来在全国演出,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爱和称赞。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另一个突出功绩就是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文艺脱离群众的状况,让文艺冲出了过去狭小的圈子,走上了广阔的天地。《讲话》以后,延安文艺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艺下乡”热潮,掀起了文艺大众化的运动。文艺工作者纷纷要求下乡、下厂、下部队,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到农村、工厂、部队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已成为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行动口号。1943 年冬,鲁迅艺术学院等 5 个专业文艺团体,分别到陕甘宁边区 5 个分区为军民慰劳演出。如诗人萧三、艾青,剧作家塞克到南泥湾,作家刘白羽、丁

玲、陈学昭到农村和部队,柳青、高原到陇东体验生活,进行创作。画家也背起画板,到工厂、农村,以工农大众为素描对象。

“文艺下乡”运动,使专业文艺工作者与民间文艺工作者结合在了一起。专业文艺工作者不仅是宣传队,而且也是播种机。在他们所到之处,许多村镇都成立了农村俱乐部,组织了业余剧团。文艺工作者用各种形式动员群众、鼓动群众、宣传群众,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种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快板、新说书、民间谚语、歌谣、自乐班以及年画、剪纸等活动都活跃起来,并涌现了许多民间新型的艺术人才,如庆阳专区的社火头刘志仁,富县的民歌手汪有庭,延安的说书艺人韩起祥等。专业文艺工作者下乡后,从民间艺术中吸收了丰富的养料,充实了自己。另一方面,他们又满腔热情地帮助民间艺人加工整理作品,使民间艺术大放异彩。可以说过去还没有一种文艺如此这样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文艺下乡,不仅普及、活跃了边区的文化生活,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民族精神的昂扬和人民群众的自身解放。

抗战中的延安文艺是伴随着民族抗战血与火的民族大搏斗而诞生的,它是真实反映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与 40 年代前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史诗。它以广阔的画卷、丰富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提供给人们认识中国现代史上这一段历史进程最为宝贵的生动材料,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此外,抗战中延安文艺真正实现了与人民群众的结合,它所体现出的开拓进取、破旧立新的创造精神以及将民族性和大众性相统一的风格,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一笔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十分宝贵的财富。而抗战中艺术家们所表现出的在艰苦环境中执著追求真理,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斗争精神,将是我们永远要学习和发扬光大的。

参考文献:

- [1] 羽宏.毛泽东同志 1936 年写给丁玲同志的一首词[J].新观察,1980,(7).
- [2] 毛主席讲演略词[R].红中副刊,1936,(1).
- [3] 萧三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50.
- [4] 老舍文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2.
- [5]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3.
- [6] 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22.